

百家文库

记录古往今来世间百态
彰显中华大地万象更新

佛儒之间

清初成鹫法师的遗民世界

Fo Ru Zhi Jian QingChu ChengJiu FaShi De YiMin ShiJie

叶宪允
著

百家文库



前40年在世俗社会为遗民的隐居生活，后46年在佛门的遗民僧历程

全面展示成鹫法师成为少年遗民的历史渊源、人生历程。细致梳理在重要历史关头成鹫法师出家为僧的种种因由和决绝的思想情感状态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佛儒之间

清初成鹫法师的遗民世界

Fo Ru Zhi Jian

QingChu Chengjiu FaShi De YiMin ShiJie

叶宪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儒之间：清初成鹫法师的遗民世界/叶宪允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 - 7 - 5068 - 7063 - 4

I. ①佛… II. ①叶… III. ①成鹫 (1637 - 1722)

—传记 IV. ①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2308 号

佛儒之间：清初成鹫法师的遗民世界

叶宪允 著

责任编辑 吴化强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9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7063 - 4

定 价 7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少年遗民	8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遗民与遗民僧	8
第二节 大明遗民方国骈	18
第三节 成鹫法师的少年遗民风云	26
第二章 坐馆与隐居	41
第一节 塾师二十年	41
第二节 三藩之乱中的成鹫法师	49
第三章 佛门岁月	55
第一节 成鹫法师出家因缘	56
第二节 成鹫的佛门传承及政治取向	82
第三节 住持岭南大刹的动因	96
第四节 华林寺住持之争及对佛门污行的批评	113
第四章 成鹫法师与遗民、遗民僧	130
第一节 成鹫法师与“逃禅”的遗民僧	130
第二节 成鹫法师与明遗民的往来	146

第五章 反清问题 174

 第一节 抗清与“通海” 174

 第二节 海南之行 184

 第三节 澳门行:再论成鹜没有参加抗清斗争 188

 第四节 从“飘然为云水之游”反观其“踪迹突兀” 193

 第五节 “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从成鹜与清朝官员
 密集交游再论反清问题 198

第六章 悠悠遗民梦 202

 第一节 忠诚与幻灭 202

 第二节 坚守与志节 209

 第三节 “天下事,无不可为” 215

第七章 “晚世之真儒” 218

 第一节 成鹜法师的儒释道思想 218

 第二节 儒家思想是主要思想 222

结 论 228

后 记 230

绪 论

成鹫法师(1637-1722年)乃清初一代奇僧,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归隐躬耕,十九岁作塾师,四十一岁出家为僧,八十六岁圆寂。作为一代文人,成鹫法师的人生命运起伏跌宕,从少年遗民到老年遗民僧,在国破家亡之时见证了明清之际的历史风云。明崇祯十年(1637)一代佛门高僧成鹫法师出生。成鹫生于广州方氏文化世家,父子号称“番禺三方”,父亲方国骅乃岭南名士,“少读书有文章名”,大有声誉,交游国中名士、国士,从游者数百人。成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号称神童,同时成鹫还力大无穷,能力举数百斤重的巨钟,“攘臂而起,擎巨钟若挈瓶然,众皆惊以为神”^①,可谓文武双全。按照传承已久的社会传统,成鹫无疑也会走上父祖的道路,科举出世,各地为官,他们父子三人被媲美于宋代“眉山三苏”,当然也有可能像三苏父子一样或许有成为一代文化大家一代宗师的可能。然而成鹫生逢乱世,明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在内外交困苦苦挣扎之后轰然倒塌,清军入关。明亡之后,十三岁已经成为诸生的少年成鹫随父归隐,尽弃科业,绝意仕途。豪勇之成鹫以晋代周处(236-297年)为榜样,不再以侠义自居横行街巷,转而收拾心性,实究濂、洛、关、闽之学。十九岁出为塾师,先后二十余年。三藩之乱即将平定时的康熙十六年(1677),遗民们的恢复明朝正统的期望彻底消失,四十一岁的成鹫毅然自行剪发出家为僧,又隐身佛门四十六年,“飘然为云水之游”,出入于广东名山罗浮山、丹霞山、鼎湖山,到过海南岛和澳门,住持过著名寺院广州大通烟雨古寺和鼎湖山庆云寺。成鹫“足之所至,兴之所寄,即事遣情,往往有诗”,号称清初诗僧第一人,沈德潜对他极为推重,在《清诗别裁集》中称“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在创作实绩上,成鹫一生中作诗一千三百多首,文章六百多篇,其他著述近十种,著述涵盖儒释道三教的著述中儒家著述和儒家思想是核心,部分著述在清代就流传海外。他号称岭南佛门的旷世奇才。成鹫的一生就是作为

^① 清·释成鹫:《咸陟堂文集》附录,《纪梦编年》,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

典型的文人而成为典型的遗民僧的一生,他是广州以及岭南文化圈的核心人士之一,也是佛门内的著名高僧,外释内儒是其本质特征。成鹫的一生正是甘于清贫、洁身自好的一生,他选择成为遗民隐士。但成鹫在广州和岭南都有一定的影响,海内著名、称雄文坛,“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结识了广州以及岭南乃至海内的世家子弟、文人集团、遗民、遗民僧,而作为明遗民他还接触结交了包括礼部尚书陈元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赵弘灿等在内的大批清朝政府各级官员,这也是成鹫法师多面人生的一种体现。

从成鹫法师身上,我们能看到在民族危亡社会动乱之际,文人们充满矛盾的人生,人物命运折射出断崖式的历史时期对文人们造成的创伤。此一时期,天崩地裂般的历史风云,故国情怀和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加之艰难世事与变幻人生中的铁血与苦难,对成鹫产生了深切影响。八十六年的生涯中他历经明崇祯帝、南明,清雍正和完整的康熙朝,他生存状态复杂多变,少年退出科举,归隐林泉二十多年,中年更是愤而出家为僧,出儒入释,都是坚守内心的理念与思想,他深入佛门是真诚的,但文人的习性从未丢失与改变,“公志行与世之逃虚空而习清净者不同日语”,本质上依然是一位抱有儒家伦理思想规范的文人士子。佛门也没有能挽救他的内心情感世界,因而对佛门劣行多有批判。佛门五十年,也是号称圣祖的康熙帝亲政五十年的时间,岁月如流水,反清复明的遗民梦越发遥远淡漠,坚守成了个人的习惯。成鹫法师在人生后期二十年大量接触结交了一批清朝政府军政官员,就能充分说明他对统治根基早已巩固的清政府的态度已变。他曾多次有反清复明的想法,但也没有参加实际的抗清斗争。他的思想和情感自少年时期始脱离不开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遗民以及遗民僧的身份是时代因素造成的,他可谓“政治和尚”^①。

遗民的研究有重大意义。明清之际的遗民与遗民僧的研究,对于展示历史风云与历史教训、学习先贤的精神价值、挖掘先代文人慷慨激荡的爱国情怀和视死如归的忠孝节义、提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而言,自有其意义。近十年来,查询有关数据库,有关遗民的论文每年都在百篇之上,可见此乃研究者所喜好的内容,因为遗民不但涉及到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刻,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思想性与惊心动魄的情感世界,也还有品行志节等中华文化一直崇尚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出,遗民研究与遗民精神的发扬仍然是未尽的话题,有继续深入挖掘的必要性。

本论文以成鹫为中心,展示明清之际百年动荡风云、士人的情感世界以及佛

^① 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门的风云变幻。关于成鹫的研究,学界的成果相对有限。笔者眼界所及主要有:《罗浮山志会编》收录了成鹫的诗文作品,成鹫与广东观察使宋广业与其子端州知府宋志益有密切交往,且多诗文应酬。《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二对成鹫有精当评价,收录成鹫诗九首。《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九艺文三、《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一子部都仅提及成鹫著《纪梦编年》。《晚晴移诗汇》卷一九五著录成鹫诗十五首,并对成鹫有所评点。由于成鹫游历过广东不少地区,故此广东省地方志记载成鹫也较多,如清代《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番禺县志》《肇庆府志》《新会县志》《香山县志》《顺德县志》《高要县志》《清远县志》《阳江志》《东莞县志》《西宁县志》等都有或详或略的资料存在,对成鹫生平有所记载。

1949年以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辑录了成鹫诗《跳大王歌》《题赈荒图为马卧仙赋》《仙城寒食歌四章》《题东华侄诗文集》。还征引撮合史料证明成鹫具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与行动。此说影响至今,为后来多位学者所因袭。为此,2009年,杨权作《成鹫“通海”辨》,对邓之诚把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可谓有所反正。

蔡鸿声《清初岭南佛门事略》^①第五章专设成鹫一章,简单论述后,全文引入成鹫自作年谱《纪梦编年》,稍显提炼不够。蔡鸿声阐述了成鹫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广州惨遭屠城的历史悲剧对成鹫的影响,指出成鹫是最典型的遗民僧,具有抗清的事实。“康熙二十一年(1682)成鹫的琼州之行,他作为身在佛门的遗民,确实踪迹突兀,情系海南,似乎参与过某种通海的密谋。……他去国之志决非一时即兴的狂想了。从上举两事,可知成鹫法师的遗民梦,有真有幻,耐人寻味。其中隐秘之处不止一端,尚待进一步去‘破读’。”^②这是延续邓之诚的看法,信息资料采集与论述服务于预先设定的错误观点。

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在清代一章第二节设“方外诗人”,论述岭南著名遗民僧、诗僧函昱和函可,再加上成鹫法师。对成鹫有阐述,评述其诗风,也认为成鹫法师反清复明。陈永正指出,成鹫法师“父逝后,奉母避居罗浮山。清军攻入广州后,督学使者传檄诸生应试,否则治罪。颢恺志节自持,不肯应试,遁往肇庆鼎湖山,削发为僧。此后曾住持庆云寺,晚年归广州,为大通寺住持”^③。此处记载,信息基本准确,但秩序混乱。首先,成鹫法师父亲方国骅在清康熙十年(1671)去世,时年成鹫法师三十五岁,他在此后几年因为生计养家糊口之故而继

① 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② 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③ 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续作塾师,在洞悉三藩之乱即将失败之时,才在康熙十六年四十一岁时愤然自行剪发出家,寄迹于南海弼唐之亦庵,并未拜师。康熙十八年,罗浮山石洞禅院元觉离幻和尚往云门山路过小漫山,遂礼元觉离幻为师,奉师命到罗浮山石洞禅院修行佛法。所谓“父逝后,奉母避居罗浮山”,失去准确性。其次,“清军攻入广州后,督学使者传檄诸生应试,否则治罪。颢恺志节自持,不肯应试,遁往肇庆鼎湖山,削发为僧”的记载也不准确。成鹫十三岁考中南明秀才,在第二年前后广州被清军占领,成鹫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清朝重开科举考试让先朝学子文士参加的命令。但是往鼎湖山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鹫已经七十二岁,出家为僧已经三十多年,这其中距离拒绝参加清朝科举考试已经有将近六十年。其间的辗转生平事件尚多,时间还长,如此关联没有合理性。这是征引一些方志中的节录记载所造成的,如《西宁县志》记载,“成鹫年十三补诸生。三十五,父故后,婚嫁毕,别母学佛于鼎湖。晚栖大通古寺。”^①此外《岭南文学史》中延续邓之诚把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的观念,有所偏差。

覃召文撰写有论文《光鹫的诗文理论》,成鹫曾法名光鹫,该文指出,“光鹫的诗文理论为清初岭南的论坛带来了一股清流,它和此期岭南的其他论家如屈大均、陈恭伊、廖燕等抗清志士以及函昱、函可、今释等爱国诗僧同声一概,奏响了一曲时代的强音。尽管光鹫之论有时也不免带着禅佛思想的影响,但仍不失儒生本色与节士气骨。”^②在介绍成鹫生平时,该文还指出成鹫“年三十五父死,次年即拜元觉禅师为师。后云游四方,曾任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并曾主持澳门普济禅院,晚年掩关于广州大通寺。光鹫一生坚守气节,曾参与南明抗清活动。”^③其中则有两点不确切之处,一是在成鹫四十三岁即康熙十八年才拜元觉禅师为师。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秋之际,成鹫到澳门,只是短暂驻足澳门普济禅院,而不是住持该寺。还有覃召文也是认为成鹫“曾参与南明抗清活动”,延续了有些学者的成见。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李福标、仇江点校的《鼎湖山志》,2015年再版,《鼎湖山志》乃成鹫所编,在山志著述中很有特色。在点校本前言中李福标对成鹫生平有所记载并有很高程度的评述,但也指出成鹫“曾往澳门普济禅院秘密进行反清活动”^④。

① 民国·何天瑞、桂站:《(民国)西宁县志》卷二十五,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部分方志使用了方志电子数据库,并保留其版本信息,以下不再逐一说明。

② 覃召文:《光鹫的诗文理论》,《岭南文史》1997年1期,第36页。

③ 覃召文:《光鹫的诗文理论》,《岭南文史》1997年1期,第35页。

④ 清·释成鹫:《鼎湖山志》前言,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此外,周军《〈鼎湖山志〉与明清之际岭南禅宗》^①着重从成鹫与鼎湖山庆云寺的关系展开。探讨明清之际岭南禅宗发展的鲜明特点和轨迹以及成鹫的贡献、作用。他指出,鼎湖山庆云寺僧众是明清之后岭南的一支重要法系。该文也引入蔡鸿声的观点,认为成鹫从事秘密抗清活动。

刘俊有硕士论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研究》,撰写于2009年。论文对成鹫生平作了简介归纳,认识到他的遗民僧身份,还研究了成鹫《咸陟堂集》的版本、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该论文对于成鹫的其他生平贡献、历史价值未有全部涉及,但仍然是系统研究成鹫生平思想的主要成绩。

近几年对成鹫的研究,还有杨权论文《成鹫“通海”辨》,对成鹫是否进行了抗清斗争进行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指出成鹫没有进行抗清活动。杨权《临济宗僧成鹫与曹洞宗华首台系的关系》一文考察了成鹫的佛门法系及其与岭南佛门曹洞宗华首台系的关系,有助于梳理认识岭南佛门以及岭南遗民僧在明清之际的状况。而成鹫师门是岭南另一重要的佛门派别禅宗临济宗,广州华林寺是主要祖庭。朱万章的《岭南金石书法论丛》一书,其中章节涉及了成鹫等人的书画艺术,成鹫本人是岭南书画名家之一,有作品存世。成鹫诗文中多有对书画的品评,他与一些画家有所交往,其岳父梁启运就是岭南善画之人。2016年,佛学杂志《人海灯》第1和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叶子的论文《清初遗民僧成鹫〈咸陟堂集〉历史价值研究》一文,对成鹫法师的创作成就进行了有价值的梳理与分析。上述研究只提及成鹫生平思想贡献的某一个侧面,有些信息以及论述并不确切。贯穿其中者是都认为成鹫从事了反清复明的斗争,而事实不是如此。成鹫的研究还可以深入展开。

本论著试图完整探讨成鹫一生之“童时、壮时、老时、衰时,种种人,种种物,种种事,种种因缘,种种苦乐”^②,尽力展示成鹫法师一生波澜起伏的壮烈人生。笔者曾撰写二十四万字的《清初诗僧第一人成鹫法师研究》,通过七章“广州方氏文化世家”“成鹫法师与广州文化世家”“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成鹫法师与官员、文人交游考”“游历”“结社”“隐于浮屠,喜为文章”“诗僧第一人”,比较细致地展示了成鹫法师的生平与贡献以及在文坛的卓越地位。本书集中论述成鹫法师前四十年在世俗社会为遗民的隐居生活,后四十六年在佛门的遗民僧历程。

第一章 少年遗民

成鹫出身于广州方氏文化世家,方氏世家在广州、岭南乃至全国皆有重要影

① 周军:《〈鼎湖山志〉与明清之际岭南禅宗》,《肇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36页。

② 《咸陟堂文集》附录,《纪梦编年》。(下凡引用《咸陟堂集》,仅注书名、卷数和页码)

响，成鹫与父亲、弟弟合称“禺山三方”，成鹫从兄方殿元以及方殿元二子方还、方朝是“岭南七子”中的成员，在岭南以及国内具有影响。其中方氏世家的重点和核心正是成鹫。成鹫获称清初诗僧第一人之赞誉。成鹫豪迈倜傥，文才过人，在佛门也是高僧，因此知交遍及岭南和海内，与广州文化世家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广州以及岭南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成鹫的文人身份是认识和把握成鹫生平、影响、贡献以及思想情感的社会现实基础。

第二章 坐馆与隐居

明清之际，国内和岭南战乱纷起，广州城遭屠城之祸，亲历其难的少年成鹫脱离科举考试，归隐成为明朝遗民，十五岁到十八岁躬耕野外，十八岁至四十岁以塾师为生。在四十一岁的盛年之际，面对“三藩之乱”即将失败，恢复明朝正统和衣冠的希望彻底破灭，绝望之下的成鹫愤然自行剃发为僧，成为遗民僧。遗民以及遗民僧这是成鹫一生的真实状态，他一生坎坷、矢志不移，避世归隐越躲越远，内心情感上处于长久的矛盾困顿痛苦状态。“中年削发，不解其故”的背后原因正是时代悲剧所造成。成鹫作为遗民与遗民僧的种种事实与因由，提供了遗民研究的一个较为细致的个案。

第三章 佛门岁月

成鹫侧身佛门近五十年，与全国佛门也渊源深厚。成鹫师门是临济宗本陈道忞门下，道忞受顺治帝宠信，赐号“弘觉国师”，但成鹫作为遗民投入此派乃机缘巧合，并不是依附清朝。成鹫出家后四处云游，后二十年，先后住持广州大通古寺和鼎湖山庆云寺，门下僧众众多。成鹫投身佛门出于至诚，绝非暂时之避世，但佛门四十六年显然没有解决好人生本质问题，他兼通儒释道，本质上仍然是文人士子。成鹫对佛门有严厉的批评。

第四章 成鹫法师与遗民、遗民僧

成鹫一生接触过大批官员文人，他也与不少的遗民、遗民僧与密切的交往，他本人正是遗民和遗民僧的重要代表。

第五章 抗清问题

成鹫少年时期选择成为遗民，后再作遗民僧，前后七八十年，号称最典型的遗民僧，他是反对清朝统治的。然而，喜舞槊弄剑、好学万人敌而又志向远大的成鹫却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抗清斗争。他先后到海南岛、到澳门都不是从事抗清活动，非为“通海”。他一生接触到不少的遗民和遗民僧，与“北田五子”和屈大均的交往并不涉及抗清斗争，并无“谋恢复再造”。最后二十年，大批清朝中央地方官员纷纷与成鹫有所接触，成鹫不再排斥清朝政府的统治。

第六章 悠悠遗民梦

成鹫法师遁入佛门近五十年,对佛门保持了忠诚,不是简单地寄身佛门作遗民。对于出家,脱离儒家以及世俗社会生活,辞别老母,抛妻别子,他是抱有真切的希望。选择作遗民并非一逃了之这样的简单,不但要彻底断绝可能的荣华富贵,还要失去曾经拥有的物质生活。遗民们对于自己思想上、节操上的努力坚守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成鹫法师作遗民坚守了七十多年,虽历经磨难,也曾有所遗憾,但一生志节没有改变;当然岁月流逝,遗民梦越发遥远淡漠,坚守成为了习惯。

第七章 “晚世之真儒”

成鹫一生著述丰富,多才多艺,文笔纵横,诗文兼通,涉足儒释道诸多方面。成鹫的人生历程、结社、交游、习性充分说明他作为传统儒家士人的特质,本质上乃一位儒家士人,他的一生无论作遗民还是作僧人,但从未改变的是他的传统文人形象,只是生逢明末清初的乱世,面对几十年的持续不断的惊天巨变,不得已一步步退却归隐。但终其一生,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根本思想与情怀。

成鹫少年八岁亡国,为少年遗民,再到四十一岁为遗民僧,终年八十六岁,以较为丰富细致的资料层层排列展示其近八十年的遗民生活,可谓遗民研究中的具体事例。细致梳理成鹫成为少年遗民的历史渊源、人生历程,仔细挖掘在重要历史关头他出家为僧的种种因由和决绝的情感状态。指明外释内儒是其人生轨迹,其根本原因是明清改朝换代的战乱杀戮导致成鹫归隐“云水最深处”。突出成鹫法师的心理状况与情感取向在他一系列行动中的推动作用,其心理历程真切地折射了整个时代。其中还专门讨论了成鹫是否反清问题,他作为遗民而入佛门,对佛门很是忠诚,但他也对佛门进行了种种批判,在文化史和佛教史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他身在佛门心怀儒家伦理情怀,也表明他的坚韧性情和对佛门的热爱。五章大致有时间及逻辑上的延续性,共同说明乱世文人作遗民的乱世情怀、困惑与痛伤。他的生平经历包含有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因素,显示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时期儒家士人和佛门的风云变幻及渊源,岭南和全国范围内的遗民群体历史风貌也得以展示,由之呈现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

第一章

少年遗民

明清之际,明亡清兴,从东北到西南,战乱几十年,此一时期,由于大批士人面对天崩地解、异族入侵的惨痛局面,精神遭受重大打击,还有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因而纷纷出家为僧,从而出现了一大批遗民与遗民僧。他们是改朝换代之际的艰难困苦情形下,维护思想与情感的纯粹而卓然独行者,代表着志节。

成鹫法师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此时已经是明朝的最后岁月,短短八年之后,明朝灭亡,他又在清朝生活了七十八年,与康熙皇帝同一年离世。虽然,明朝灭亡之时,成鹫法师年龄尚幼小,但他却是清初非常重要的一位遗民与遗民僧。他经历了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面对了岭南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几十年的沧桑历史,明亡时的1644年他只有八岁,到十三岁为诸生(秀才)后选择归隐避世,作塾师二十多年,面对南明与清朝相持的局面而韬晦自存,然后是三藩之乱的变局,在三藩之乱即将结束时,他彻底失望之下出家为僧,这时已经是1681年,他已经四十一岁。其后他在佛门四十六年,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圆寂于广州大通烟雨古寺,享年八十六岁。成鹫法师一生跨越明朝崇祯、南明,完整跨越清朝顺治、康熙二帝。此时,绝大部分明朝遗民早已离世,时代状况也早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此八十六的成鹫法师可谓是最老的遗民或遗民僧,一身经历复杂多变,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本书征引具体资料分析论证成鹫法师“逃禅”过程,辨析成鹫法师“通海”问题,指出他是少年时期就跟随父辈成为遗民,为遗民七八十年,他与明遗民和遗民僧们有密切的交往,试图通过成鹫法师一人之种种思想情感之历程,见证明清之际文人知识阶层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遗民与遗民僧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伟大的时代和灿烂的文明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之,一般指亡国之民,即前朝遗留之人。《左传·哀

公四年》：“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杜预注：“楚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主。”^①《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②历朝历代有遗民之论者代不乏人。而历史上最早的遗民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③历代文献关于遗民之记载不胜枚举。有人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水平最高的伟大时代。盛唐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战乱，而后是宋代统一。宋代时期中国精神与物质文明极度发展，但却国势衰颓，可谓内忧外患一直没有消除，在与辽、西夏、金、蒙古经过近三百年的战乱对峙之后，终亡于蒙古。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人完全为少数民族所统治。宋人理学昌盛，文人集团最受重视，思想文化灿烂，文人众多。宋亡，出现了空前庞大的“遗民”群体。遗民们高尚的节操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焕发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与情感抒发，同时也造就了遗民历史与遗民文化，写下中国历史与文化史中可歌可泣的华章。

晚明以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世界上地理大发现和资产阶级的技术变革正在发生，贩卖奴隶与殖民贸易在全世界血腥展开。利玛窦等为代表的传教士正把西方文化和技术知识带入中国。但大明这个老大帝国在近二百年大致和平延续中，晚明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仍然在自身固有的惯性中行进。但一场巨变正在悄然逼近。明亡清兴，繁华和平的大幕落去，露出了时代铁与火的残酷真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动乱与战火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历史周期的怪圈反复出现，一代代勤劳的中华民族先人辛苦积累的财富往往化为灰烬，家破人亡的惨剧反复上演。明清之际就是典型的悲剧时代。从东北到西南，战火燃遍了全国各地，动荡旷日持久。清军南下，一系列大屠杀惨绝人寰，千万人死于非命，百姓生灵涂炭的苦痛自是不言而喻，而更加胸怀天下推崇孔孟之道忠孝节义的广大文人士子们，面对庙堂堂皇、交游唱和、诗词歌赋、花鸟鱼虫转瞬间转变成尸骨如山、山河破碎，他们感怀人生，有难以言传的精神和情感痛伤。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有违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温柔敦厚、仁义礼智信。战乱之际，众多文人游走在生死荣辱之间，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顺清廷，一部分人视死如归起而抗清，更多的则是选择归隐，作隐士或

① 晋·杜预：《左传杜林合注》卷四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4页。部分古籍文献使用了中国古籍电子数据库，并保留其版本信息，以下不再逐一说明。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3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13页。

遁入空门。但无论归隐何处身在何方,总归是无处可逃,内心的困惑、失落、沮丧都是自不待言,苦痛与挣扎难以排解,深深的幻灭与绝望无处不在。奔走与抗争,反清与复明,出世与入世等诸多矛盾集合于一身,呈现出复杂的多重意义。

遗民在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最多,不但涉及到改朝换代,也关涉到异族入侵,华夏文明受到威胁。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有特解:“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①清初邵廷采《宋遗民所知录》有云:“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于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余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仿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氏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其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见章格庵、熊鱼山、金道隐数人,既逃其迹,旋掩其名。”^②遗民与遗民僧们体现着忠孝节义,代表着视死如归的精神。生于乱世的慷慨悲歌,包含有丰富的思想性与情感内容。

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对大明王朝杀伐骚扰。从崇祯元年(1628)起,陕西农民大起义,然后遍及各地。大明王朝在天灾人祸、内外交困之下,朝政腐败、党争剧烈,已经国是日非、全面衰败,统治根基日趋削弱,最终亡国。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吊死;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几经更迭逐步败退的南明政权与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合抗清。从东北到西南,战火燃遍了全国各地。紧随其后,三藩之乱起,历时八载。明清易代鼎革之际,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向明朝发难,至明遗民张煌言被杀的康熙三年(1664),有四十六年,到三藩之乱时间更为长久,时间是1681年。考虑到明遗民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明清之际的抗清斗争和思想文化动荡的时期则更为长久。丁志可在《明朝遗民的大清岁月》前言中说:“他们以‘汉臣’自居,他们是被大明王朝抛弃的孤儿。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万岁山自缢身亡,是为‘甲申之变’。崇祯帝的‘驾崩’宣告了有着二百七十六年基业的大明王朝的覆亡,而李自成则在北京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当起了‘皇帝’。只是未等李自成在北京站稳脚跟,投降了清军的明朝总兵吴三桂便带领着十余万清军对

①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前后三四集》卷二,清康熙刊本,第147页。

② 明·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思复堂文集》,1987年版,第212页。

其进行疯狂的反扑,农民军未能击退清军的进攻,被迫撤离北京。5月初,清军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明亡清兴,江山易手他族,在混乱中惊魂未定的汉族士人在新政权下很快就面临着自我安顿的问题,是俯首称臣还是自我放逐?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选择自我放逐于新政权之外,誓不向新政权称臣,或积极斗争、反清复明,或埋头著述、不问俗世,这些人被称为明朝遗民。”^①田崇雪《遗民的江南》中说,“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世黄昏。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特别的严酷。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了选择。以往的‘遗民’或战或降,或进或退,还有个选择。这一次大不同了,隐也不是仕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谓进退两难。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在当了两千多年的奴才之后似乎有些若有所悟,表现在许多著名的‘遗民’对‘遗民’自身的认识上。在清康熙十五年,黄宗羲曾多次郑重其事地诠释‘遗民’的内涵。他认为,遗民产生在国破家亡之际,表征着人间正气,道德人心。”^②

明清之际,“忠义人物前仆后继,大量涌现,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烈赞歌。据清康熙年间徐秉义撰《明末忠烈纪实》一书中所收明清对峙时因抗清而死的义烈近三百人。清初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收录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1628-1662年)因抗清而死事的人物即达三百余人。近人孙静庵撰《明遗民录》一书所收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守志不屈的明遗民有八百人。而乾隆年间敕编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所载,在明清对峙的全过程中因抗清不屈而壮烈死难者更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足见明清之际忠义人士之多。”^③孙静庵在《民史氏与诸同志书》云:“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予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明清之际,国破动荡,国家沦亡,百姓流离,而士人们不事清朝,宁死不屈者大有人在,而更多士人则是选择以‘逃禅’的方式隐于山林以避乱世。佚名朝鲜人撰之《皇明遗民传》中共收录明遗民716家,孙静庵所辑《明遗民录》中辑遗民800余家,而近人谢正光、范金民先生据208种明遗民传记资料所汇辑《明遗民传记索引》计得遗民共1393人,其中逃禅者217人,这还仅仅是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病骥老人序孙氏《明遗民录》云:“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

① 丁志可:《明朝遗民的大清岁月》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田崇雪:《遗民的江南》,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 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明清之际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遗民漂泊海外者就有数千人之多，其整体队伍之庞大可以想见。遗民不仅队伍庞大，分布的区域也极为广泛，几乎遍布了大江南北及东南亚各国。逃于海外者因资料匮乏而无从详考，主要应集中在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南洋诸岛。遗民大抵分南北论，南方遗民群体以南京为核心，分布于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其中江苏和浙江是遗民活动的两个中心，也是遗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南京是朱元璋开国之国都，又是南明弘光政权的所在。因此，遗民们燕集此地，凭吊故国、怀念故都，更重要的是他们拒不接受国亡的事实，企图东山再起，有所作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是抗清势力相对集中、抵抗顽强的地区，其原因是因为三地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基础，著名遗民有杨园、黄宗羲、张岱、方以智、陈确、阎尔梅、屈大均等。北方则以关中、山左地区为中心，尤以关中为盛，著名遗民有李二曲、朱子斗、王弘撰、李柏和孙枝蔚等，著名遗民顾炎武晚年定居于关中。因地域文化差异及清兵入关时间的先后，清政府对各地的戮掠程度亦有不同，南北方的遗民人数明显呈南多北少的形态。”^①刘雪梅还作有“明清之际逃禅遗民统计表”，共记遗民 217 人。

遗民们往往有出家为僧者，故称遗民僧。“所谓遗民，是指在易代之际，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清初昆山遗民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提到：‘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所谓遗民情结是指遗民阶层在易代之后对昔日旧主、旧朝、故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坚定执着、无时或释的怀恋之情，对此赵园先生总结到：‘遗民不但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价值立场、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甚至是时空知觉，是其人参与设置的一整套的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形式：与故国，与新朝，与官府，以至与城市，等等。’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他们大多一身兼三任——遗民、诗人、释子，这一集合型群体是政治、宗教、文学三者相结合的特殊产物，往往体现出政治、文学与宗教人物的三重人格。”^②遗民僧兼有“遗民”与“僧人”双重身份，作为遗民意味着不仕后朝，他们还要信佛避世，可谓毅然决然者。遗民僧大致有三个区域，即江南、岭南、和西南地区，这与南明朝廷逐步退却相一致，因而三地的遗民和遗民僧不单是本地士人，即具有全国意义。

明清之际遗民逃入空门为僧的历史现象，研究已经很多。“研究内容涉及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的重要著作有：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中国禅宗思想

① 刘雪梅：《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第 25 页。

② 刘雪梅：《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第 16 页。